

「誰」的聲音：原住民族聲景研究 與社會實踐的可能性與限制*

林靖修**

摘要

本文以筆者從 2019 年在卑南族社區和族人一起進行的聲音民族誌研究為基礎，首先闡述筆者如何透過一系列的說明會和聲音工作坊，取得族人合作研究的同意。再者，本文將說明在與族人一起建置聲景資料庫的過程中，如何勾起族人對於聆聽與記錄日常生活聲音的興趣，進而透過將近兩年的工作，開啟數位聲景資料庫的工作。在建置資料庫的過程中，如何在尊重原住民族智慧財產的前提下，讓資料庫得以公開使用，這是筆者與族人目前遇到的問題。然而解決問題的方式可能是迂迴的。本文將說明近三年和族人一起合作 podcast 的經驗，以及一個實驗性的感官民族誌研究如何轉化成具有創新性的社會實踐，最後反思這具有公共性和實踐性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推動上可能面臨的困境，以

* 本文首先要感謝 SMK 部落的卑南族人的協助與耐心，願意和我一起探索原住民族聲景研究的可能性。更要感謝 Haku 頭目賜給我 Lrenaw 這個名字。在聲景研究方面，在此特別感謝范欽慧老師的教導和經驗分享，尤其是提供我籌劃與組織聲景工作坊的方法。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的同仁則提供數位聲景地圖的製作技術指導，卑南族青年協助計畫團隊進行聲音後製並願意投入 podcast 的製作。臺東大學知本校區是位於 SMK 社區的傳統領域內，本人認同這項肯認。

**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教授，E-mail: watanlin@nttu.edu.tw

此探討實驗性的人文社會研究和原住民族知識研究在當代原住民族社會的限制與可能性。

關鍵詞：聲景、人文社會實踐、公共人類學、感官民族誌、原住民族

一、合作式研究與研究設計之間

回顧近二十年來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如何透過高等教育的教學、研究和社會實踐回應『社會需求』」（林聰敏，2018）成為高等教育革新和社會創新研究的重要課題。如同陳東升所述：

大學是地方社會的重要成員，開放大學的邊界，藉由大學的專業知識、研究發展人力、地方社會問題導向的課程、充沛的學生人力資源，可以促成地方社會積極地發展自主性與韌性（陳東升，2018：31）。

隨著大學社會創新或社會實踐的計畫逐步推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許多關於這類計畫的方法論、認識論、個案研究、研究倫理，以及教學和實踐場域的連結等議題的討論也熱鬧地展開（蔡瑞明編，2018）。

高等教育機構和研究者如何進行社會實踐、擔負社會責任呢？現在正在進行各項回應社會責任的學術機構似乎都強調「和在地社群建立合作伙伴關係」，然而要如何建立合作伙伴關係呢？如果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是一項和在地社群「共同」執行的計畫，那所謂的「共同」又是由誰主導？研究者與報導人之間是如何互動、形成合作？他們如何形成合作共識？在形成共識的過程中如何相互理解？其中是否也蘊藏各種權力協商的動態過程？在實務面向，這樣的合作計畫可能遇到什麼樣的問題？有什麼樣的限制？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當我們高舉大學必須回應社會責任，或者是強調「學用合一」時，上述關於合作研究在方法論、認識論和實務反思等面向的討論顯得相當重要。

在高等教育機構中，並不是所有學科都被設定為需要走出校園、和社會大眾面對面接觸，然而強調「田野調查」為主要研究方法的人類學者則是被要求要經常和田野的報導人建立長期的關係、參與研究場域的各項活動和儀式、也要在參與報導人的日常生活中領悟各項道理。縱觀人類學的學科發展，如何將人類學的研究應用在研究者所關注的領域，或者是藉由研究成果貢獻在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上，是該學科重要的發展方向之一。近十年 Borofsky (2010) 所提倡的「公共人類學」(public anthropology) 也逐漸受到學界重視，其研究方法與精神強調從理論與實務著手，讓人類學研究與實踐介入(engaged)各項具有「公共性的議題」的討論、批評或倡議(advocacy)，進而形成行動方案。

在研究取徑上，無論是應用人類學或公共人類學都強調「跨學科整合研究」的重要性。例如當人類學應用在災後重建的議題時，若採用傳統強調學術理論取向的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至少要從學習報導人所使用的語言、經歷一段漫長的田野調查(fieldwork)才有可能更貼近「在地人的觀點」，如此才能找出因時、因地、因文化制宜的「好的」災後重建視野。但是這樣的研究與災後急需重建的時間急迫性是不一致的，而且災後重建還需要許多不同領域的專家協助，因此強調和不同學科合作研究是應用人類學所必須採取的措施(劉紹華，2010)。

除了人類學之外，當代的原住民族研究也相當重視研究者與報導人之間形成合作式研究。毛利學者 Linda Tuhiwai Smith (2002) 便提出「去殖民研究方法論」(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的批判性精神與策略，強調和在地族人合作進行研究，並且在研究過程不斷反思研究者與合作伙伴之間的權力不

對等關係、不同文化轉譯之間的知識權力關係，以及殖民和政府治理對於當地原住民的影響等。

然而，當我們在討論大學和報導人之間要如何建立關係、反思彼此的互動與合作關係的性質，和評估計畫所帶來的影響時，需要理解每個研究各自的時空脈絡。以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為例，在 2005 年政府頒布《原住民族基本法》之後，臺灣的原住民族研究必須要在族人同意、尊重原住民族主權，並周全地保護原住民族知識的智慧財產權的前提下才能夠開展，因此研究者與報導人之間的協商、溝通、互信是研究的根基。此外，近年來學術界更加重視對於研究倫理的要求，因此在討論和反思合作關係時，也需要納入對於外部環境和歷史脈絡的理解。

為了能從具體案例思考大學社會責任的計畫在執行合作研究的利基和可能的限制，本文以筆者自 2017 年開始至今在臺東縣 SMK 社區和卑南族人共同合作的「聲景」研究為例，藉由描述和反思筆者如何和族人建立合作伙伴關係、如何與族人共同執行計畫，以及在執行計畫時遇到什麼樣的問題。本文也將闡述從學術理論到實踐計畫的發展過程，以此檢視和反省在理論／實務、理想／現實之間的落差，以及思考這樣的落差對於當代社會實踐計畫的意義。

二、原住民族聲景計畫的發展脈絡：專業者的獨白與眾聲喧嘩的聲音

「原住民族聲景計畫」是筆者在 2017 年開啟的一項具實驗性的人類學民族誌研究，研究場域是在臺東市 SMK 社區，當地

的居民以卑南族人居多，也因此本計畫可以視為是筆者和卑南族人合作基礎上的學術研究。本項研究主要是鼓勵族人在生活場域內錄音，累積族人日常生活、經濟活動、狩獵採集、或特殊祭典儀式的聲音，以此建置聲景的資料庫，並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建立臺灣原住民族聲景數位地圖（soundscape map）。透過聲景資料庫和數位地圖的建置，筆者嘗試理解與詮釋原住民族聲音與空間關係，進而理解原住民族與自然環境和生活環境之間的互動，透過聲景的探討體會與再現族人的日常生活特性、生命經驗，與他們如何感知所處的世界。

所謂的「聲景」（soundscape），係指在某個時空脈絡下，可以被人們所感知、經驗或理解的聲響環境（sonic environment）。「聲景」的概念逐漸受到重視，這要歸功於 1960 年代加拿大音樂作曲家 Murray Schafer 的提倡。他所理解的「聲音生態學」（acoustic ecology）和「聲景」（soundscape），是指透過聲音的媒介去研究人與其所身處環境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人們越來越習慣從視覺感知世界，而忽略了聽覺的重要性；尤其是居住在城市的人們，越來越習慣生活周邊的噪音，而忽略了環繞在身邊的各種聲響。

受到「聲景」研究的啟發，「原住民族聲景計畫」則是將此「聲景」的概念運用在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與社會研究之中。一方面，這項計畫希望透過「聲音」的蒐集、分析與研究，能夠和當代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研究對話；另一方面，在感官民族誌的學術脈絡下，藉由聲音的研究進而貢獻在尋找建構或體悟更貼近於原住民族生命節奏與感官經驗。此外，這個研究的「聲音」至少有兩個層次的隱喻：一個是讓經常被人忽略的「聲音」多重感官經驗能夠成為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中的重要環節；另一個「聲

音」則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實驗性的研究，尋找另一個讓原住民族人「發聲」（voices）的方式。

在臺灣原住民族的聲音研究中，從既有的數位典藏成果，我們可以發現臺灣現有的原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大多數的資料庫都區分為影音、聲音與音樂等三個類別，例如臺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原民會）、臺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知識入口網、原住民族數位典藏（科博館）、臺灣原住民藝術影音資料庫、臺灣社會人文電子影音數位博物館（北藝大、中研院），以及風潮音樂數位計畫。整理既有的原住民族數位資料庫，可以稍微掌握主流社會或者是學術界是如何看待原住民族的聲音。就類型而言，是以音樂、語言和人物口述為主；就資料的屬性而言，是以既有的典藏資料為主，新的採集資料為輔。就採集的主動性而言，通常是採集者（研究者）主導，麥克風在採集者身上而非原住民族身上。我認為這些資料庫都是單向的資料庫，由研究者或典藏者出發，原住民族社會與文化是被蒐集與被整理的。這些資料庫也是將原住民族的聲音依照典藏單位和學術的喜好來來分類，透過各種分類將原住民族的聲音納入可能不是屬於原住民族的知識體系之中，而透過學術和非原住民族的分類也可能讓某些聲道消音，讓原住民族的聲音只呈現出他者重視的部分。

這些典藏的數位資料並沒有結合聲音與空間之間的關聯性，而且也沒有關注原住民族音樂和語言之外的多樣性聲音，尤其是原住民族日常生活的「聲景」。筆者認為對於原住民族而言，在自然環境中活動的聲音也同等重要。像是在農地耕種時各種勞動所發出的聲音、在冬季劃破夜晚布幕的獵槍聲響、走在暗黑山路小徑的腳步聲、烤火的劈哩啪啦聲……都說明著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至於寂靜或空曠地方的風聲、寧謐山林中像是被擴音的各

類動物聲音，或是渺無聲息的公墓區等等，這些無聲勝有聲的情境，也是原住民族生活場域中具有代表性的聲音。這些聲音並不是井然有序的出現，而是共構的，有層次地、混雜地、疊合地，或偶然地出現。不同的聲音對於不同的人而言也有不同的意義。這些聲音跟原住民族音樂、語言、口述歷史不一樣，它們難以被歸類，不容易掌握、系統化，與知識化。而且這些聲音是隨機出現，並不是在一個安排好的場景下錄製的。

上述關於原住民族聲音的數位典藏計畫的討論帶出兩個重要的課題：如果要以原住民族為主體，建構原住民族聲音的知識體系，該如何進行呢？如果原住民族的聲音不僅有音樂、歌舞、祭典儀式、歌謠、語言，還包括日常生活與周邊環境的聲音，那這樣的聲音，以及聲音與空間所共構的聲景，又要如何被掌握、描述、理解與分析呢？

從 2010 年起，「聲景」的概念逐漸在藝術領域受到歡迎，許多從事聲景創作的藝術家和音樂專業人士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他們在各地錄音時，許多當代原住民族人居住區域的聲音也因而被採集。然而，這些藝術專業者使用的錄音器材都是相當專業、價格昂貴，錄音工作是由專業者執行，麥克風掌握在他們的手中，族人參與這些計畫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若仔細觀察與臺灣原住民族相關的聲音資料庫，可以看見所謂原住民族聲音的蒐集是建立在主流社會或學術機構對於他者的想像上的，這些資料庫雖然在保存文化上有重要貢獻，同時卻也可能將原住民族的主體性束諸高閣。另一方面，臺灣的各項聲景計畫雖然可能蒐集了當代族人的聲音，呈現族人的聲景，但是這卻是藝術專業者獨白式的研究，原住民族人很難參與其中。

在上述的脈絡下，筆者所想要探索的是，有沒有可能由族人自己拿著麥克風，主動錄製他們認為有趣或有意義的聲音？是否有可能基於族人們所蒐集的聲音資料，建置屬於當代原住民族的聲音資料庫，並呈現和再現他們所理解的聲景？透過原住民族聲景的研究，是否能夠提高當代原住民族「發聲」的可能性？透過這樣的研究，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當代的原住民族社會與文化地景，以及他們與環境的關係？

三、在研究室發展的聆聽行動研究理路

原住民族聲景計畫是一個希望將麥克風交給族人，讓族人自己錄製聲音的實驗性計畫，因此這樣的計畫必定是一個「合作」的研究計畫，也是一個具有社會實踐精神的計畫；而這樣的計畫也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計畫。

人類學的聲音研究逐漸受到重視，有學者稱為 *sounded anthropology*、*anthropology and voice*、*sound and anthropology* 等。這些關於聲音的研究不限於傳統的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主要是試圖挑戰人類學長期以來視覺（*visual*）為主導，而忽略了聲音、錄音與聽覺經驗重要性的研究方向。除此之外，在田野中具有稍縱即逝（*ephemerality*）特性的田野訊息（例如各種聲音的訊息與表現），過往也經常被人類學者忽略。因此聲音的研究在人類學研究方法（*methodology*）中具有創新性、實驗性與必要性的意義（*Samuels et al., 2010*）。

除了在研究方法上的貢獻之外，聲音的人類學研究也能夠從不同的感官經驗來體現一個社會的文化。*Steven Feld* 很早便倡議

聲音研究在人類學領域的重要性，在 *Sound and Sentiment: Birds, Weeping, Poetics, and Song in Kaluli Expression* 一書中，他在位於巴布亞紐幾內亞的 Kaluli 研究 Bosavi Song 的儀式性歌曲時，除了關注儀式性展演、文本與音樂等傳統人類學者有興趣的議題外，他更重視在這展演過程中的聲音表現，並探究這些聲音表現的變遷。藉由儀式性展演的聲音研究，他進一步探究 Kaluli 的宗教與社會文化，以及族人如何藉由不同的聲音表現，來回應其所身處的政治經濟環境對他們的壓迫，因而提倡聲音研究就是文化系統的研究（Feld, 2012: xxiv）。

Steve Feld（1984）更進一步提出 Acoustemology 的概念，也就是聲音人類學研究是結合聲學（acoustics）和認識論（epistemology）的研究。將聲音視為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a way of knowing），而且這樣的理解方式是一個在行動中進行的，發生和聆聽是一個人們在聲響環境中理解世界的行動。藉由聲音理解世界有別於人們長期以視覺主導的研究，因此也是一個實驗性的研究。然而這樣理解世界的方式或許過於抽象，是故我們應該從脈絡化的方式理解聲景，而不是將聲音視為是穩定社會結構或文化模式的呈現（例如 Alan Lomax 於 1962 年發表的 *Song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如此才不會落入類型化的困境。

在理解聲音的社會與文化意義上，Weidman（2014）認為聲音（voice）在人類學是一個沈默的範疇。但是，研究聲音是有意義的，他提出聲音（voice）是文化、社會與政治生活的中心。聲音（voice）是現象，這現象連結主體性的物質性實踐（material practices），所發出的聲響（sounds）也鑲嵌著集體性認知的意義。因此聲音是連結個人與集體的文化和社會政治的領域，在這領域內包含社會與文化所共享或競爭的論述在價值、情感、美學。另

一方面，聲音也是可以分析的範疇，聲音受到文化與歷史性特殊時空所形塑，是一種聲響性的（sonic）、物質性的（material）和文學性的（literary）實踐，也是個人主體性、文化本真性與政治權利展現的範疇（2014: 38）。尤其是在當代，全球化與媒體的快速發展，透過聲音的研究將有助於人類學者研究與分析當代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意義、生活處境與掙扎（Minks, 2008），或可以從聲音的展現去理解原住民族在爭取人權的原住民族運動中的意圖與他們所受到的遭遇（Faudree, 2013）。

聲音與空間是無法分開的，如同 Christoph Wulf 所說：「人的身體本身就是一個聲音的場址（sites of sounds），人們不僅生活在意象（images）的心智世界，也活在各類聲音所構成的心智世界中。」（Wulf, 2016: 20）Kabisch 則提醒我們「音樂和聲音是被鑲嵌在地景，在地的各種元素的集合會影響音樂的風格，同時音樂連結在地的特性、物件與行動，彼此共構成一個混合的世界。」（Kabisch, 2008: 228）聲音跟空間是不可分的，每個空間不僅是物理的空間，也是聲景（soundscape）。Corbin（1998）則提醒我們，聲音的地景（landscape of sound）是具有時空意義的，它一方面是形塑集體認同的場址，但也隨著時間變化而不斷改變樣貌。聲音的地景是同時存在、相互競爭與重疊的各種聲音所創造出來的空間。

因此，我們不僅要關注所謂「美」、「和諧」的聲音，也要留意各種生活上的「雜訊」或「噪音」所透顯的意義。Jennifer Hsieh（2021）關於臺灣都會區噪音的聲音人類學研究中指出，都市的噪音可以被視為是 sonic climate，噪音環境是社會性、歷史性的。「噪音」關乎於人們認為某些聲音特別有意義或者是無意義，且「噪音」也讓我們理解到身體與環境、自身與鄰居和生活

環境的關係。因此，在研究過程中，筆者也建議族人可以錄下各式各樣的聲音；在聆聽錄製的聲景時，筆者也會留意在某個場域同時出現的不同類型聲音。

當聲音人類學逐漸受到重視之際，Tim Ingold（2011）提醒我們，聲音的人類學研究不能重蹈視覺人類學的覆轍，後者讓視覺感知被客體化，反而阻礙我們從多重感官經驗來體會、分析與再現我們所理解的世界。因此，他認為我們應該拋棄「聲景」（soundscape）的概念，而應該將聲音視為是一個經驗的現象（phenomenon of experience），而不是物質性或心智性的實踐而已。我們應該從整體的身體經驗來思考各種感官經驗的現象。

為了回應 Tim Ingold 的憂慮，以及受到上述聲音人類學研究沒落的影響，筆者在擬定研究方法時，採用以下幾種研究取徑，或者可以視為是聆聽與蒐集聲音的研究方法，這包含：

- （1）首先是回應 Tim Ingold 的憂心，筆者設計和族人進行 sound walking，由他們帶領研究者或研究團隊，一起透過走路來探索在沿路的各種聲音，讓身體感、空間感與各種感官經驗可以融合一起。藉由 sound walking，我們也將學習原住民族對於聲音的知識與分類。
- （2）邀請族人錄製他們認為在生活空間中最喜歡的聲音（my favorite sounds）。藉由「最喜歡聲音」的蒐集，我們將聲音與族人的生命故事連結，也能更進一步發掘與理解他們對於聲音、聽覺的感官經驗。
- （3）部落聲音的民族誌。與部落族人合作，在參與部落重要的祭典活動以及日常活動（events）時，從事民族誌調查與聲音錄製。在部落生活空間中擇定幾個地區，定點、定時、

分時段錄製該區域一天的聲音，藉由聲音體會特定時空中的人群活動。

- (4) 記錄部落職人的聲音。在田野期間，筆者與工作團隊追隨部落中的工藝師、獵人、農夫、巫師、音樂人等職人，在他們的同意與合作下，錄製他們工作過程的聲音，體會他們的身體感、空間感與聲音之間的關係。

上述的研究設計，是在公共人類學，以及聲音人類學和聲景研究脈絡下所發展而來的，具有社會實踐與跨領域研究精神。同時，透過和族人共同合作的設定，筆者也希望這樣的研究具有反思和賦權的可能性。然而，當這樣實踐型計畫走出研究室，落實在社區時，會遇到何種限制？當一個帶有批判性、實驗性和具有「合作式」精神的研究在現實的世界中展開時，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呢？

四、以聲音為名的陌生人

(一) 合作場域背景：SMK 社區

筆者在前三節說明「聲景」的感官民族誌研究的研究理念與研究設計，簡單地說就是希望藉由此研究不但能記錄和詮釋族人所蒐集的聲音；也能讓族人能夠透過聲音傳達他們的想法。過去關於聲景的策展或研究，通常是計畫執行者或研究者拿著錄音裝置和麥克風到處錄音，但是筆者所設想的計畫卻是希望將這些錄音設備交到研究伙伴，也就是族人的手中。然而「將麥克風交到族人手中」並不只是單純地傳遞這項物件，而是要將一個複雜的

研究概念分享給合作伙伴，並取得其同意的過程。在此之前的首要工作，則是需要找到願意聽我說明研究計畫的合作伙伴。

筆者在 2018 年中開始在 SMK 社區進行「聲音、空間與現代生活：當代台灣原住民聲景地圖與數位資料庫計畫」，這個研究主要是和族人合作進行日常生活的聲景的蒐集、分析、研究與再現。SMK 社區是臨近臺東大學知本校區的卑南族社區，東大校園過去即是族人的傳統領域。社區位於臺東市，鄰近臺九線，距離知本火車站約五分鐘的路程；常住人口大約八百人，多數居民的主要經濟活動為農業和打零工，近年也有返鄉青年從事社區發展與社福工作。SMK 社區和其他的卑南族一樣，有男子會所（巴拉冠）制度。從過去的卑南族青年會所和年齡組織的研究而言（陳文德，2012；笠原政治，2009；喬健，1972；鄭耀男，1995），社區族人的年齡組織和其他卑南族社區相似。SMK 社區的男子會所和年齡階級制度是互為表裡的，年齡階級制度有 cakuvan、valisen、vangsaran、musavasavak 和 ma'idangan 等五個階級：cakuvan 主要是國小或幼兒園學生；國高中生屬於 valisen；通過長期的 valisen 訓練和試煉，並取得長輩認可後可進階至 vangsaran 階級；結婚的 vangsaran 則進階成 musavasavak；到了耆老的階段則從 musavasavak 進階到 ma'idangan。

年齡階級與頭目制度相連結，族人在祭典儀式和社區事務上都相當尊重 ayawan（頭目）的意見，尤其是在各個祭典儀式中，ayawan 都是最主要的祭祀者和典禮主持者。在一年的歲時祭儀當中，最重要的兩個節日是七月中下旬的 kemaderuna（收穫季）和從每年十二月到隔年一月初的年祭（amiyan）。年祭包含十二月初的少年祭（mangayangayaw）、十二月中到月底的大獵祭（mucalun），以及新曆年元旦的鞦韆祈福（katikelruwanan）、

除喪（venasivas/remavaravas）和成年禮（kituvangsar）。在這些儀式中，vangsaran 和 valisen 是最主要執行者，他們被期待要完成長輩所交付的任務。

青年會所和相應的政治社會組織是維繫社會的重要力量，而家庭又是支持成員的基石，兩者相輔相成。但是 1960 年代之後，族人逐漸被納入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基於經濟考量，許多族人選擇到外地工作（石磊，1975）。此外，valisen 階段是養成與訓練的重要階段，然而這個時期卻也是課業繁重、有升學壓力的國高中階段，在時間上的相互排擠也讓許多長輩不再要求小孩必須參與青年會所的活動。

即便社區的巴拉冠制度曾經受到大時代變遷的挑戰而式微，但是為了舉辦每年的各種歲時祭儀，族人還是持續維持巴拉冠制度的運作，只是原本系統性和嚴謹的養成訓練不再，從例行性組織變成較為鬆散的臨時性編組，或是縮短某項技能的訓練時間，也有些活動因而逐漸消逝。不過也有幾位令人敬重的長輩堅守崗位，且利用各種機會傳授技能，使得大多數的傳統技藝和手工藝並沒有明顯的斷層。社區總是有不同世代的族人保有令人敬佩的手工藝技能，包含木雕、藤編、狩獵文化和竹編等等。

從 1990 年代開始，社區頭目便透過木雕工藝來傳承卑南族的文化（李柏黎編，2012），將社區打造成一座木雕村，並在 1993 年成為臺東縣第一個獲選「全國十大環保模範社區」的社區（廖敦如，2004：13）。2000 年之後，社區內的知識青年開始藉由提案爭取國家社區發展相關計畫的補助經費，並逐漸重建式微的巴拉冠制度。首先是將已經逐漸鬆散的年齡階級制度重新組織化，包含重視進階儀式、規定不同階級應著不同樣式的服裝、增

加 valisen 和 cakuvan 階級的訓練等。恢復巴拉冠制度的責任主要是落在「青年會」會長、副會長以及熱心的成員身上，他們都是屬於 vangsaran 階級。

除了致力於復振巴拉冠制度與年齡階級的文化之外，SMK 社區的青年也著手申請與社造、文化發展、語言復振相關的國家計畫，多方面地守護與發展社區。根據族人發行的《Mena'u SMK 生活誌》，可以了解青年為社區注入的各種力量，包含「建和社區文化健康站」的營運。這個計畫串起了青年與社區長輩，由青年為長輩服務，而長輩也在此進行文化和記憶的傳承，讓社區的不同世代凝聚在一起（楊婷瑜，2020）。從 2015 年起，社區開啟「SMK 活力計畫」，在原民會的經費支持下，族人在這五年間建置與培育社區之自治組織，復振族群傳統文化，例如溯源家族歷史、建置族譜資料、設計各家族的特色家徽、製作社區遷徙的數位地圖、傳承藤編技藝等。文化部的「原住民族村落文化發展補助計畫」，則提供機會讓族人找回 karuma'an（祭屋）信仰祭祀中心的軌跡和文化意涵，讓族人連結自身家族和祭屋的關係。

（二）以聲音為名的合作協商

無論是青年返鄉後投入的社區發展和文化復振，或者是更早之前由頭目透過木雕工藝所引領的社區營造，「聲音」都不是族人所關注的項目。但這並不表示「聲音」在社區生活中不是重要的文化元素。

以 tawriwlr（或稱為警鈴）研究為例，它是由一個接近於圓錐體的金屬圓桶，在圓筒中放置一根金屬棍，這些金屬通常是鐵或鋼的材質。以木頭雕刻的人形裝置（族人稱為「守護」）連接這個能夠發出金屬敲擊聲響的組合。這個人型裝置的木柄能夠

插入人們後臀的褲腰間，藉著人的走動發出聲響。在年齡階級的制度中，valisen 在訓練、執行任務和參與儀式活動時，都要配戴 tawlrwlr。當族人回憶以往的生活時，tawlrwlr 的聲音是令人懷念的。又以祭典儀式的聲景研究為例，在從陽曆十一月底到隔年一月三日的「年祭」（amiyan）期間，族人結合社區的鞦韆文化、年祭和聲景研究，蒐集人們參與大獵祭、猴祭、除喪儀式和年祭時的各種聲音，收錄地點包括祭典現場、日常生活、農田、山林以及青年會所。除此之外，在三年的合作過程中，族人更以社區特有的「鞦韆」文化為主題，錄製族人從分工討論、採藤、砍竹子、製作鞦韆底座、綁繩和爬到竹竿末梢綁定竹子的聲音，並以此發展 podcast 節目。

經過三年多在 SMK 社區的聲景研究之後，筆者學習到許多卑南族關於聲音的原住民族知識，且更能體悟族人的聆聽感受。或許是因為從事聲景研究，社區族人在和筆者交談時，或多或少會聊到個人所在意的、具有回憶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聲音」，也會分享他們對於蒐錄收音的點子。從族人願意和我分享聲音、帶著我所提供的設備錄製聲音，以及和我討論族人對於「聲音」的看法與分類等現象觀之，當初的研究設定，也就是將「聲景」研究定位為「合作式研究」，似乎是符合期待的。

在社區經過兩年多的合作，某次和擔任計畫兼任助理的社區族人一起在長輩聚會中分享所蒐錄的聲音之後，長期參與分享會的社區頭目突然問我：「教授，你有我們的名字嗎？」得知沒有後他說：「那你以後就叫 Lrengaw。」我問：「請問 Lrengaw 是什麼意思？」頭目解釋道：「這是聲音的意思。」社區並沒有人以 Lrengaw 為名，而我則成為第一人。頭目跟大家說：「他一直在記錄和研究我們的聲音，這個名字可以給他。」

從計畫開始執行，到被頭目命名為 Lrengaw，筆者經歷了將近兩年半的時間，才能和族人與與形成具有「合作」形式的聲景研究。在研究初期，我是 SMK 社區的陌生人，當時我認識的族人不超過五位，甚至也沒有把握這樣的計畫可以在社區展開。筆者首先是和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的畢業生取得聯繫，該畢業生當時是社區會議主席，且為專業的音樂人。我向他說明計畫內容並取得他的支持。接著透過他的介紹認識社區青年會幹部，在取得幾位核心幹部的同意之後，才開始著手進行這項研究。

事實上，第一次向青年會核心幹部介紹計畫構想時，我感覺族人是摸不著頭緒的。有一位族人提到：「請問老師，你到底要做什麼呢？通常有大學老師來我們這邊都會很清楚地說要我們做什麼，但是我不清楚你的計畫是要做什麼？」另一位族人則說：「錄聲音？什麼聲音都可以嗎？」雖然僅有四五位伙伴參加我的計畫說明會，不過提問卻很踴躍；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對計畫有興趣，而是對於計畫有很多的疑問。

或許計畫寫得過於理想，既要以學術面向討論聲音的感官民族誌與哲學性的思考，但又要結合社會實踐與具有合作精神的研究，讓國科會願意支持這樣具有實驗性質，且是一個多年期的計畫。如此具有實驗性質的計畫，在計畫初期連我都不知道未來會變成什麼樣貌。一方面，強調將麥克風和錄音設備交給族人，同時也是交出蒐集聲音的主動權，無法掌握他們會錄製什麼樣的聲音。另一方面，對研究者而言，這種實驗型的研究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況且聲音是多樣性的，在面對報導人提問要錄製什麼聲音時，過於精確的回答反而會讓成果走入研究者所設定的框架（雖然這項研究也既存著「合作研究」的框架）。筆者在擬定研究設計時，從聲景的發展脈絡、感官民族誌的文獻探討和研究方法的

爬梳，都有清晰的圖像；但是落實在實際的田野工作時，一切都顯得不確定。

為了讓族人青年願意和筆者持續探索聲景研究的可能性，以及不要過早和這項計畫斷絕關係，在計畫初期，筆者做了兩個安排。首先，筆者並不急著取得族人合作研究的同意，而是持續地和青年會做更多的溝通，有時是單獨地簡短談話，有時是參與青年會的活動。再者，在青年會的推薦下，筆者聘請兩位青年（男女各一）擔任計畫的兼任研究助理，透過工作會議讓他們更了解這個研究的構想，同時也讓他們開始著手錄製他們認為有趣和日常生活的聲音。

「聲音」的多樣性與多層次性，是我和研究助理的溝通重點之一。當助理一開始錄製聲音時，往往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不知道自己所錄製的聲音是否符合計畫目標。但是當我們一起聽聲音時，他們慢慢發現，筆者似乎沒有一定的喜好，每則錄下的聲音都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甚至環境的背景聲響也可以成為討論標的。而且他們也發現，聲音不是一個固定的符號，而是一個過程，一個聲響可以再細切成許多段落，每個段落是獨立的，同時又是整體的一部分。一開始，筆者和助理們花了很多時間在討論他們所錄製的聲音，在這個討論過程中沒有太多價值判斷，取而代之的是許多關於聲音樣態、內容的討論。當他們理解這個「聲音計畫」沒有僵固的形式，而「聲音」則是多樣性且「什麼都可以」，這就達成筆者和助理之間的「共識」——或許是「沒有共識的共識」。這樣的經驗在往後和更多族人分享研究設計時，更顯得至關重要。

除了上述的努力之外，透過不斷地跟族人說明計畫精神的過程中，筆者也探詢如何從聲景研究連接卑南族社區的日常生活與

文化研究。經過半年以上的努力，筆者與青年會終於慢慢地找到彼此合作的基礎，那就是這項研究確實讓某些族人對於存在於生活周遭的「聲音」產生興趣，並嘗試使用計畫所提供的錄音器材來錄製他們認為有趣或值得錄下的聲音。當計畫執行漸有眉目之際，族人即將迎來一年一度的年祭。對 SMK 社區的族人而言，年祭不僅是一月一號和一月二號的活動，還包含事前的祭典準備、搭設鞦韆、青年會所的青年訓練、成年禮、猴祭、社區男性上山準備祭典所需獵物的大獵祭、在大獵祭期間在山區的山林知識的傳承與學習，以及各項祭典儀式的準備工作等等。因而也讓筆者與少數加入研究團隊的成員有機會能夠錄製屬於社區的聲音。由於在此階段筆者尚未於社區會議說明並取得研究同意，因此我們只有錄製一些環境的聲音，主要是希望在社區會議中呈現這些聲音，並讓更多族人理解這項計畫的精神與目的。

社區的大獵祭結束之後，研究計畫也邁入第二年。當族人逐漸從祭典儀式的非常生活轉為日常生活時，計畫團隊則利用年祭過後的社區會議說明這項研究。族人的社區會議並不是原民會所指定的「部落會議」，而是社區幹部和熱心參與的族人們定期召開的會議，地點是在當時社區會議主席的家。在既定議程結束之後，社區會議主席給我機會說明研究計畫以及分享初步蒐錄的聲音。許多族人都感到相當有趣，並提供團隊未來可以錄製的方向。村長則分享這個研究讓他回憶起小時候冬季強勁東北季風吹動整片防風林的聲音，但是隨著防風林被砍光之後，這樣的聲音也就消失了。

在大家熱烈的分享下，計畫就在「非正式」的社區會議中取得合作同意。事實上，經過將近一年在社區的摸索，其實多數與會的族人都聽說過這項計畫，但是隨著筆者和族人越來越熟識，

以及加入研究團隊的族人們開始錄音，並在不同的場合和族人分享他們對於這項計畫的理解（雖然每個人的理解都不一樣），族人並非不熟悉這個計畫，只是有點霧裡看花地看著研究團隊在社區穿梭。所謂的「霧裡看花」也表示多數族人並不清楚他們可以如何和研究團隊「合作」。

（三）形塑「合作者」

筆者總共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取得社區會議同意，這也才開始踏入所謂「合作式」研究的第一步。值得慶幸的是，這是一個三年的計畫，如果僅獲得國科會一年的補助，這樣具有「合作」精神的研究是無法執行的。然而，從計畫初期的摸索、參與計畫族人的陌生感與最終取得社區會議同意，這說明將學術研究計畫設定為「合作式」研究，或者是具有「大學社會責任」的研究，是一件值得再三思考的事情。雖然就這項聲景研究而言，筆者在擬定計畫時，希望是以「賦權」、「反轉」、「批判權力」與「共作」的精神為基礎，發展出「合作研究」的必要性，並設計一系列的聲景的研究方法。但是反思自身的研究過程，在「聲景」的議題上，合作是必要的嗎？族人為什麼需要和研究者合作呢？我們又能帶給族人什麼樣的「合作」的利基？這樣的提問或許沒有辦法有明確的答案。從反思性批判的角度審視研究初期的過程，筆者認為本計畫中所謂的「合作」精神並不是理所當然地存在，而是被研究者所「營造」出來的。

然而這樣被營造出來的聲景研究，和許多具有明確目的性和執行指標的「合作式」研究還是有些不同。除了要將麥克風交給族人錄音的執行策略與構想之外，這項計畫並沒有明確的研究目的。就如同族人聽到我說明研究構想時的反應一樣，他們之前接

觸一些學術機構的「合作」研究通常會很明確地告訴族人：計畫需要什麼、要怎麼做、他們要如何「共作」（或配合）等等。但是這項研究並沒有這樣做，這也使得族人不容易理解，讓研究變得相當具不確定性，尤其是對於外來產出的不確定性。當族人詢問問題時，我的回答通常是：「我們先錄看看，之後我們再一起討論這些聲音可以做什麼。」在此情況下，一旦越來越多族人參與計畫，研究者便逐漸從「倡議者」或「發起者」，轉變成「協助者」和「資源提供者」。然而，無論是筆者的研究計畫或者是族人曾經接觸過的「合作式」研究，都有一個共通性：合作場域和合作需求其實是被計畫所創造出來的。

當計畫開始在社區展開之後，以及當族人聆聽我和研究助理所錄製的聲音時，他們逐漸理解到計畫所要關注的「聲音」，是他們感興趣的「聲音」，或者是覺得有趣的「聲音」。一方面，許多願意來聽筆者說明的族人感到好奇，他們經常會問說：「這樣真的可以嗎？」、「什麼聲音都可以錄喔？」這時幾位計畫的研究助理通常會幫筆者說明，分享他們參與計畫的經驗，這對於族人理解計畫是很有幫助的。另一方面，「聲音」的多樣性和計畫的不確定性或許也鼓勵一些族人對於計畫產生興趣，進而參與其中。在舉行說明會或工作坊時，有些族人會持續懷疑地問道：「計畫可以沒有明確的目標嗎？」、「你說什麼聲音都可以錄，那……這樣的聲音可以嗎？」。例如，有一位婦女就用狐疑的口氣問：「那我發現每一家剝雞肉的聲音都不一樣，這可以記錄嗎？」當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這樣的聲音很好啊！」許多參與者馬上發出「喔！」的長音。

當初突顯計畫的不確定性，以及「聲音」本身的多層次的樣貌和抽象性，在形塑計畫具有公共性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關鍵。

這和許多具有明確「公共性目的」的計畫不同，並沒有在研究設計時就訂下明確的目標。這也產生很有趣的迴路，原本是希望藉由反思既有的公共性計畫來發展「原住民族聲景研究」，這樣的思考同樣具有明確目的。但是在執行時，卻又讓計畫變得不容易預測、充滿不確定性。然而，這樣難以捉摸的計畫，以及「聲景」的特性，卻無形中開創出「公共性」的空間。這樣的位移之後，筆者認為差別在於：許多計畫的公共性，是研究者和在地社群中具有影響力的人合作，以此產生讓更多人受益的路徑；但是本次的原住民族聲景計畫則是開創一個社會空間，讓一般大眾都可以參與。在「聲景研究」的領域，每個人所蒐錄的「聲音」的價值是平等的，沒有高低之分。

研究計畫所創造的不僅是「合作」的場域，也包含「合作夥伴」。讓我們再回到取得社區會議同意之後的研究歷程。為了能讓族人更理解「聲景」的概念與研究計畫的精神，筆者和社區的卑南族兼任助理著手辦理聲景工作坊，除了邀請先前參與過計畫的族人外，也廣邀有興趣的社區族人來參加。社區中有位國中老師的母親與長兄都是母語老師，我們便借用其母語教室舉辦工作坊。聲景工作坊主要的內容，是由筆者所設計的一系列「聲景」之聆聽、記錄與詮釋的練習。藉由這些練習，族人可以增加對於聆聽的敏感度，理解聲景的多樣性；而筆者也以此蒐集族人對於聲景的看法，並將他們對於某類聲音的興趣轉化成可操作的錄音規劃。除此之外，筆者也會和族人分享其他聲景計畫的成果或聲音資料庫，提供族人更多關於聲景研究的想像。

參與工作坊的族人大多是青年會的成員，他們有的是未婚的 valisen，有的是 vangsaran，有的是 musavasavak，以及和他們年紀相當的女性族人；整體而言，男女的比例相當。參與工作坊的

青年如果有興趣加入研究團隊，或者是有想要錄製的聲音卻需要研究者協助，研究團隊（包含我和兩位兼任助理）都會予以協助，但我們僅提供設備和協同研究，並沒有給予費用。長輩則是很少參與工作坊，僅有那位提供我們工作坊場地的國中老師的母親加入。雖然社區長輩在工作坊缺席，不過透過個別訪談族人對於過去聲音的記憶，以及筆者對於 tawlrilr 研究所進行的訪談，也讓幾位長輩能夠參與計畫。兩者的差別是，參與工作坊的青年是主動地開始錄音；而長輩則是被動地接受研究者的訪談。

無論是工作坊或者是訪談社區長輩，透過不同形式的分享過程，研究團隊形塑出聲景研究的「合作伙伴」。參與者因為研究者才「突然」意識到，原來周邊有那麼多不同種類的聲音，記錄和呈現社區樣態的方式並不侷限於視覺化的文字、照片和影音，也可以是單純的聲音。原來日常生活的聲音也是很有趣的，也可能引起「外人」的興趣，例如就有族人錄製拉開罐裝海尼根啤酒的拉環聲、青年準備去買奶茶的對話、廚房的炒菜聲、馬桶的沖水聲等等。

當筆者與幾位熱心參與的社區族人蒐集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日常聲景之後，研究團隊逐漸有信心和 SMK 文健站合作，利用文健站夜間聚會的時間，分享我們初步蒐集的社區聲音。SMK 文健站是社區重要機構，主要由青年負責營運，以此照顧社區長輩（包含令人敬重的頭目）。對於擁有年齡階層和強調長幼有序的 SMK 社區而言，文健站在某種程度可以視為「社區青年應服務長輩」這個社會價值的具體實踐。文健站的主要活動是週一到週五的上午時間，但是青年會不定期地在晚間舉辦一些文化傳承和分享社區歷史的聚會，地點通常是在頭目的家。

第一次舉辦聲景的分享會，是利用文健站在頭目家分享社區老照片的聚會，當長輩看到許多令人懷念的長輩影像以及過去生活的照片，觸動許多塵封已久的回憶，大家也熱烈地彼此討論。緊接著就是聲景的分享會，為了這次的分享會，我和研究團隊挑選了幾段日常生活的聲音，包含 tawlrilr 發出的聲響、農用搬運車發動的聲音、長輩聊天的聲音、電鋸聲、削木頭聲、木雕工具聲等，這些聲音是族人青年認為會引起長輩興趣的聲音。透過幾則聲音的分享，筆者也利用這個機會跟社區長輩正式介紹「聲景」研究。這是一次成功的分享會，尤其是在公開的場合取得頭目認可，並期待大家支持這個計畫。參與分享會的長輩也紛紛提出他們的建議，有的希望我們可以去錄製他家獵狗的喘息聲、獵人的口技、動物聲音，也有人邀請我們到他的倉庫，他想要將存放在倉庫的許多機具發動，讓我們錄製令人懷念但是因為現在已不太使用器具的聲響。幾位女性長輩則是用懷疑的口氣問我們：「用手機錄聲音就可以了嗎？」當我聽到這樣的問題時，當下是相當激動的，因為我最初的研究設計，就是希望能夠讓許多社區女性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參與當代的原住民族文化研究。

經歷過第一次的分享會後，這個「聲景」的研究開始有更多的族人參與，包含長者和青年。隨著參與者的人數越來越多，計畫團隊蒐集到的聲音類型也越來越多元，數量也變得相當龐大。有些參與者直接拿著研究團隊所提供的錄音設備，一開機就是一兩個小時，甚至更久；相反地，也有幾秒鐘的瞬間。在舉辦第一次分享會之前，計畫團隊僅有四百多則的錄音檔；在分享會後的半年期間，計畫團隊共有四千多則的錄音檔。即便參與者增加，聲音檔案倍數成長，但是並不是多數的族人都參與其中，不過「聲景」的研究似乎開始在社區逐漸有自己生長的土壤。或許因為這

樣，在計畫的第三年的某次分享會，頭目才給予我 Lrengaw（聲音）這個名字。

然而，若我們檢視這個當初就設定要「合作」的計畫執行過程，可以發現這是一個研究者單向度的思考，或許因為預設和族人共作的方向，使得研究瀰漫著不確定性。但就是這個不確定性才讓報導人擁有可以介入的空間。合作的社會空間是被創造出來的，而合作的伙伴也是透過工作坊與分享會而慢慢形塑而成的，這不是一個高舉合作研究大旗，就能讓身為「陌生人」的研究者能夠找到研究伙伴的夢幻劇本。

（四）以專業為名的單向度錄製聲音

隨著研究時程的推移，研究團隊在族人的共作下，所蒐集的資料數量已經變得相當龐大，由於族人錄製的聲音檔都是數位檔案，轉檔、儲存和建置資料庫變成相當吃重的工作。有些族人提供的是不間斷地長時間錄製的聲音，因此除了儲存原始檔案之外，研究團隊也需要邀請族人重新聽一次自己所錄製的聲音，並指示研究團隊哪些段落是需要特別保存的。不僅如此，每個聲音檔案都需要取得錄音者的說明，包含錄音的時間、地點、內容說明，研究團隊也會詢問錄音者所錄聲音的意義。

上述這些關於聲景研究的後製工作需要剪輯器材、電腦和安靜的聆聽環境，但是這些工作是很難在社區執行的，因此大多是在校園內的研究室完成。不過願意分享錄製檔案的族人並不一定有時間前往大學校園協助研究者進行後製，在這樣的情況下，研究團隊只能依照族人對於錄製檔案中所要強調的聲音的描述進行剪輯，剪輯完成後再播放給錄音者聆聽。

研究團隊將原始檔案和剪輯後的檔案分別放置在「聲景資料庫」之中，以此保存族人寶貴的聲音檔案。雖然在社區收錄聲音時已經逐漸具有合作式的精神，但是在後製與建置資料庫階段卻又轉為是研究者與錄音工程專業者的單向度操作。不僅如此，如果研究者或者是族人想要使用聲景資料庫的聲音檔，在擷取數位檔之後，通常還要再依照使用情境與目的，將聲音檔案輸入至調整音軌（例如 OS 系統的 Garageband）的軟體中，調整每個檔案的音軌音量、進行優化。當族人錄製聲音時，雖然有其想要收錄的重點，但音檔中混雜了環境聲音、人聲、動物聲音、風聲等，因此需要調整音軌，加強他們所要強調的聲音面向，並弱化其他聲音。有些時候為了避免對話聲音被聽見，也要進行模糊化的工作。

上述關於建置「聲景資料庫」以及專業錄音的工作都不是族人所熟悉的，但是在保存和使用上，這些工作卻又是必要的。這使得以「合作」為名的研究在後製階段卻又回到研究者的封閉式工作。即便有些族人會到學校和研究團隊一起聽聲音、剪輯聲音和進行後製，但是會來研究室和研究團隊工作的族人，通常不是後來提供大量聲音資料的長輩，而是又回到最初密切合作的青年和少數對於這項研究有興趣的中年族人，他們的年齡都低於四十五歲。聲景資料庫的聲音檔案有兩種類型，分別是錄音者錄製的原始聲音檔，以及族人後製的聲音檔案。前者通常是長時間的檔案，後者的聲音檔通常不超過一分鐘。事實上，這些後製的聲音檔案可以視為是另一個創作，因為或許錄音者當時候想要強調的聲音並不一定能夠如他所設想的方式被後製，而後製的檔案也蘊藏後製者對於這段聲音的詮釋與想像。除此之外，當筆者要使用族人所授權的聲音檔案進行公開展示時，筆者也會再製所選擇的聲音檔案，讓聆聽者能夠理解我想要傳遞的概念。

在具有封閉性與創造性的後製階段，要彰顯與族人「共作」的精神顯得相當困難。這也突顯出研究方法與認識論的困境，那就是「哪個聲音」是重要的呢？族人分享他們認為值得記錄的聲音給研究團隊，研究團隊也記錄每筆聲音檔案的錄製脈絡和在地意義；但是當研究團隊和參與後製的族人在建置資料庫、剪輯和發表族人所認為重要的聲音時，卻又依照個人的理解加以調整，如此的聲音到底是「誰」的聲音呢？有些聆聽者希望能聽見原始的聲音檔，因為這樣比較「真實」，但是人們在聆聽時，即便聲音環境中還有許多干擾的聲音，通常還是可以專注在自己想要聽取的聲音。這也讓所謂的「真實」不一定能符合我們習慣的聆聽經驗。

（五）從研究室再回到社區

隨著族人在聲景研究中的參與越來越深，研究團隊一方面蒐集族人所錄製的聲音，另一方面則是要建置和維護聲景資料庫。聲景資料庫的資料，無論原始檔案或後製的檔案都是來自於族人，必須要謹慎考量如何保存、運用，以及保護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創作。

當計畫成果轉變成資料庫的形式後，我們才發現當初並未對傳統智慧創作和個資的保護進行詳細規劃。雖然在擬定計畫時已經決定將來會將聲音歸檔並製作資料庫，可是當時連能否蒐集到聲音都不確定，「是否有足夠份量的內容來支撐一個資料庫？」更是遙遠不可及的問題。但隨著計畫推進，我們也迎來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包括資料屬性、個資、權利歸屬與授權使用方式等需要審慎處理的事項。

雖然參與研究的族人都有簽署研究合作同意書，但是在筆者所建置的資料庫中，每筆資料都設有智慧財產權的欄位，希望由錄音者標註聲音檔案的授權使用範圍。分別為：（1）直接下載但不能為商業使用、（2）需要取得同意才能下載、（3）只開放特定人士下載以及（4）不公開。這四種授權分級是和族人討論後的結果。不僅如此，筆者也曾在公開場合答應族人，必須要等到四千多筆資料都標註完成之後，才能將資料庫內容對外公開。

然而這樣的標註與授權方式在實務操作上卻是有困難的。首先，許多聲音提供者（尤其是之前曾經錄製大量聲音的族人）沒有時間再重新聽他們所錄製的聲音。再者，部分的聲音資料中包含族人們的聲音（清楚程度足以讓熟識者能夠辨別其身分），還有部分是由族人錄製其他族人的活動，這一類型的聲音檔案又該取得錄音者還是被錄音者的同意？假如要透過研究團隊一一詢問合適的授權者，勢必要花費大量的人力與時間才可能完成，這也會不斷地延後資料庫對外公開的時程。

當聲景計畫逐漸引起族人的興趣，吸引許多人投入之後，這也讓大家更加期待能夠聆聽集合眾人之力的研究成果。但是建置聲音資料庫的工作量與所花費的時間超乎預期，加上標註權利歸屬與授權使用方式的作業遲遲沒有完成，這使得部分族人開始質疑這項計畫對於社區發展或文化傳承的貢獻。等待研究成果公開的過程是令人不安與焦慮的，要如何讓族人可以及早地使用聲音資料庫成為一項新的挑戰。筆者在研究初期的焦慮是來自於害怕沒有人願意參與計畫、合作關係建立不起來，以及整體計畫充滿著不確定性；但在建立起合作關係並蒐集族人所錄製的聲音之後，如何在保障原住民族傳統智慧財產與個人智慧財產權利的前提下

分享這些聲音（尤其是這些資料多數是仰仗族人所收錄），則成為另一項新的挑戰。

在徵詢參與計畫的族人之後，我們所達成的共識是從「聲音資料庫」挑選合適的音檔，以這些音檔搭配訪談，採用主題式的方式錄製 podcast 節目。這個企劃並非只是單純地想製作關於 SMK 社區的聲景節目，而是出自於尊重原住民族智慧財產的角度。即便每筆聲音資料的標註尚未完備，但就族人而言，這個聲景資料庫是屬於社區共同所有的，這也是當初筆者在說明研究產出和研究倫理時對社區族人的承諾。如果聲音資料庫的內容能先提供族人使用，那就可以邊運用資料庫，邊和族人持續將資料分類、標註。因此，社區的青年會便邀請幾位年輕族人仔細聆聽聲景資料庫中各種類型的聲音，並以既有的聲音素材發展主題式的廣播節目。

年輕族人聆聽聲音資料的過程中，也從聲景資料庫內挖掘出許多寶貴的素材，逐漸發展出一系列關於 SMK 社區鞦韆文化的主题。族人擬定一個錄製 podcast 的流程與分集討論，同時也在社區中尋找在適當的錄音場地、主持人、記錄者和與談人。接著，族人從聲景資料庫中挑選並重製八到十則的聲音檔案，穿插在 podcast 節目中，讓聽眾可以透過族人長輩的介紹與聆聽聲音資料，了解社區的鞦韆文化以及對於這些聲音的詮釋。對於隻身在異鄉打拼的族人來說，收聽這樣的節目也讓他們和家鄉產生更緊密的連結。

在資料庫尚未完成授權和標註使用方式之前，製作 podcast 節目則讓所謂的「合作式」計畫能在研究到產出的過程都能夠保有公共化的實踐，但是製作 podcast 節目卻和製作聲景資料庫一樣，都是屬於封閉式的工作，是由一個核心團隊進行規劃、錄音、

訪談與後製。不過 podcast 節目和資料庫建置的差別在於其核心團隊是以族人為主，而聲景研究團隊則轉為資料與設備的提供者。

五、結論

本文的重點並不是要呈現 SMK 社區的原住民族聲景研究成果，而是希望藉由反思計畫執行的過程，思考具有社會實踐精神的公共人類學研究可能遇到的限制，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問題。筆者所提出的原住民族聲景計畫是從擴大公共參與的角度出發，希望藉由和族人一起工作、一起蒐集聲音、豐富當代臺灣原住民族（尤其是卑南族）的日常生活的聲景資料。透過提供適合的錄音設備與辦理工作坊，讓更多族人參與這項計畫，也讓更多不同的聲音能夠被記錄。因此，筆者將這樣的計畫定位成一個具有公共人類學實踐精神的聲景計畫。

為何筆者認為「擴大參與」是重要的呢？當我們整理既有關於原住民族聲音或民族音樂的研究，研究者可能基於「搶救文化或語言」的使命感，盡力地蒐錄了許多珍貴的民族音樂、歌謠、口述歷史和語言的資料，這些資料相當珍貴，也成為我們如今理解某個族群音樂和聲音的資產。但是這樣的資料卻可能忽視了族人在某個歷史片段與日常生活的聲音，而研究者蒐錄聲音的對象也可能僅止於少數在民族音樂、語言和口述歷史領域中具有造詣和涵養的族人。這使得過往的原住民族聲音研究所呈現的是少數族人的聲音。然而，筆者所設想的原住民族聲景研究則是希望能夠從另類的研究取徑讓更多族人的聲音和不同類型的聲音可以被聽見。筆者也希望讓聲景研究不再專屬於於研究者或是專業的錄音工作者，而是能將錄音設備交給族人，讓族人能主動記錄他們認為值得被保留的聲音。

就如同許多強調社會實踐研究精神的學術研究一樣，本研究強調公共性、合作精神、批判反思以及賦權的重要性，希望能藉此研究將大學學術資源和跨領域的研究能力帶入至原住民社區，也在尊重族人與取得族人研究同意的基礎上展開研究。但是筆者在進入田野時，族人對於聲景研究的陌生，以及不習慣和沒有明確研究目標的研究團隊合作的情況，似乎提醒我們具有「大學社會責任」或「公共性」的學術研究中，在操作上還是有許多值得思考的部分。

首先，「為什麼族人需要和研究者合作？」在本文，筆者揭露自己最初如何爬梳既有的文獻和原住民聲景研究，進而發展一項具有「反思性」和「公共性」的聲景計畫。在計畫尚未離開研究室之前，如此具有公共性的「合作式」研究充滿熱血和理想性。然而當計畫和研究者進入田野之後，卻彷彿為了「合作計畫」需先要形塑出適當的「合作者」；諷刺的是，原本希望將族人放置於主體位置的研究計畫，卻成為將他們放在被動位置的「被合作計畫」。

隨著計畫的推展，當族人越來越清楚研究計畫的內涵與精神，也越來越能理解與投入在計畫之中，所蒐集的聲音筆數越來越多，表面上看起來是計畫團隊和族人終於能成功地一起「合作」。但這是因為族人理解了這個計畫，還是計畫形塑了一群可以參與的「合作者」？從原住民聲景計畫的推動之初左支右絀的窘境，透過辦理工作坊、說明會、分享會等等的方式，我們不難發現研究計畫形塑「合作者」的軌跡。

但是我們可以很具有「批判性」地指出：「原來合作計畫或所謂的『具有社會責任』的計畫是一個研究者單向度的規畫」嗎？就筆者所推動的聲景計畫而言，我們當然可以說族人是被「形塑」

的行動者，但在與族人互動的過程中，有些族人所驚訝的是：「原來這件事情（聲音）也是重要的啊？」。對照他們之前所接觸的「合作計畫」，都是以「發展」、「解決困難」或者是「搶救文化」為主題，他們對於這個不在相同軌跡上的合作計畫感到困惑，某種程度是否也代表既有的合作經驗限制了族人的想像？在這樣的脈絡中，與其說是族人是被動地「被形塑」，或許也有可能是一個具有「倡議」精神的研究計畫逐漸獲得族人認同的過程，是研究者與族人不斷地找到合音的動態過程。在此過程中，沒有主動與被動，而是彼此互為主體的動態協商，多方行動者不斷地形塑階段性短暫的行動方案，而這些行動方案又成為下一個階段的基石。在聲景計畫的第三年，族人所蒐集的聲音的主題、形式和數量等都已經超出原本計畫的預設；隨著聲音資料的多樣性與個人化，原住民族智慧財產權和研究倫理等問題躍然而生，這也是出乎預料的。

無論是批判性地指出合作計畫是「形塑」合作者的角度，或者是從合作計畫是一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動態協商過程的視野，這都說明具有「社會實踐」性質的行動者，其樣態都是不斷變動，而非僵固的。然而要讓在合作計畫中的行動者彼此理解，進而找到可以一起工作的方式，需要彼此磨合和等待，需要不計時間地努力了解合作伙伴。但是多數具有「目的性」的發展研究計畫卻未必能提供等待與磨合的空間。如果筆者的計畫沒有成功獲得族人的認可與合作，或許三年過後還是停留在原地；假如研究者為了追求公共性而廣邀不同行動者加入，花費許多時間磨合與等待，也取得「合作」的認同，卻導致無法在計畫時限內完成預期的結果，但是即便如此，就能斷定這是一個「失敗」的合作計畫嗎？

本文描繪一個具有公共性和實驗性的「公共人類學」的實踐軌跡，從單向度地擬定研究設計，進入田野後的漫長迷航，繼而與族人一起找到合作的方式，以及在脫離生活脈絡的研究室整理聲音資料，以此讓聲景資料能夠在顧及蒐集脈絡的情境下被保存，最終讓這些聲音以聲景資料庫的形式再度回到社區，變成族人可以使用的素材。這個過程充滿各種矛盾與衝突，也充滿各種協商與挑戰，計畫的行動方向並非直線前進，而是迂迴且隨機的。這或許是筆者個人的體悟，但也可能是多數合作計畫所共同擁有的特性。如果是後者，我們若能仔細地描述合作計畫的行動軌跡，或許更能在合作計畫中找到合作者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也更能理解研究者在不斷地位移中，開創更多讓所有參與在計畫中的行動者彼此合作的空間與可能性。

參考書目

A. 中文文獻

- 石磊，1975，〈建和村卑南族的社會變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0：119-142。
- 林聰敏，2018，〈科技與社會如何共舞：科技部跨領域計畫推動經驗的分享〉。收錄於林文源等編，《科技 社會 人 3: STS 跨領域新驛路》，頁 291-299。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 笠原政治，2009，〈臺灣卑南族的兩個祭祀〉。《東台灣研究》13：95-138。
- 陳文德，2012，《卑南族》。臺北：三民書局。
- 陳東升，2018，〈地方社會公共實踐的外部結構與互動機制〉。收錄於蔡瑞明主編，《新實踐與地方社會》，頁 17-51。臺北：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辦公室。
- 蔡瑞明主編，2018，《新實踐與地方社會》。臺北：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辦公室。
- 喬健，1972，〈卑南族呂家社祖家制度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4：1-21。
- 楊婷瑜編，2020，《Mena'u：kasavakan 生活誌》。臺東：kasavakan 建和部落。

- 劉紹華，2010年1月11日，〈從「八八水災」思人類學特質〉。
取用日期：2023年12月10日，檢自：<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317>
- 廖敦如，2004，〈原住民部落的社區重建：以台東縣建和社區為例〉。《原住民教育季刊》34：5-26。
- 鄭耀男，1995，〈卑南族的教育會所〉。《師友月刊》335：85-89。

B. 外文文獻

- Borofsky, Robert. 2010. *Why a Public Anthrop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rbin, Alain. 1998. *Village Bells: The Culture of the Sense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Countrysid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Faudree, Paja. 2013. *Singing for the Dead: The Politics of indigenous Revival in Mexico*.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Feld, Steven. 1984. "Sound Structure as social Structure." *Ethnomusicology* 28(3): 383-409.
- Feld, Steven. 2002. *Sound and Sentiment: Birds, Weeping, Poetics, and Song in Kaluli Express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sieh, Jennifer C. 2021. "Making Noise in Urban Taiwan." *American Ethnologist* 48(1): 51-64.
- Kabisch, Eric. 2008. "Datascapes: A Synthesis of Digital and Embodied Worlds." *Space and Culture* 11(3): 222-238.
- Lomax, Alan. 1962. "Song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Ethnology* 1(4): 425-451.

- Ingold, Tim. 2011. *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 London: Routledge.
- Minks, Amanda. 2008. "Performing Gender in Song Games among Nicaraguan Miskitu Childre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8(1): 36-56.
- Samuels, David W. et al. 2010. "Soundscapes: Toward a Sounded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9: 329-45.
- Smith, Linda Tuhiwai. 2012.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New York & London: Zed Books.
- Weidman, Amanda. 2014. "Anthropology and Voic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3: 37-51.
- Wulf, Christoph. 2016. "O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 *The Senses and Society* 11(1): 7-23.

Whose Voices: Reflections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Soundscape Research and Social Practices in a Taiwanese Indigenous Community

Ching- Hsiu L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soundscape research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Taiwan. Since 2019, I have conducted soundscape research in a Pinuyumayan community. This research was designed as a practice of public anthropology and cooperative research with indigenous people, beginning with information sessions and sound workshops in the community. This paper explains this project sparked the community's interest in listening to and recording daily life sounds, leading to nearly two years of work on the digital sound database. A key challenge that emerged as we constructed the database was preserv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while also making the database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Th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was not straightforward. I also explain the experience of collaborating on a podcast with the community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to document the process of turning practical sensory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to innovative social practice. Finally, I reflect on the challenges of this public and practic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discussing the limitations as well as possibilities of collaborative, community-bas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societies.

Keywords: Soundscape, Public Anthropology, Sensory Ethnography, Indigenous Peopl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E-mail: watanlin@nttu.edu.tw